

译者行为研究

【专题导言】本专栏由五篇论文构成,分别是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译者行为度》、李正栓和杨志艰的邓恩《歌(去抓住一颗陨星)》译者行为考辨、何克勇等人的《求真、顺应、合规、接受: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影视翻译评价四维框架》、刘锦晖和文军的《李清照词冰心译本的译者行为探析》,以及高晓仙和赵国月的《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

作为理论的建构者,周领顺讨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译者行为度问题。“译者行为度”作为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收录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和《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对其深度阐发和应用,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价值,能够发挥指导研究的作用。

李正栓和杨志艰借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工具,考辨了邓恩《歌(去抓住一颗陨星)》的译者行为;刘锦晖和文军主要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和“务实”概念,具体通过冰心翻译的李清照词进行了译者行为探析。理论有引导挖掘事实和进行辨析的作用,作者用得恰到好处,分析过程和结论都能够做到令人信服。

何克勇等人结合影视翻译的媒介特征与传播需求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求真、顺应、合规、接受”(TACA)四维影视翻译质量评价框架。它属于理论创新的一部分,且直接服务于影视翻译领域的评价实践。

高晓仙和赵国月以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视野,具体从译入和译出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书名的翻译对于传播效果和传播模式的影响,它对于当今译学界热烈开展的文学译介和传播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直接对接了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需求。总之,本组文章将理论建设、理论应用与新领域的开拓融为一体,是一组质量颇高的译者行为研究成果,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译者行为度

周领顺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本文系统讨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译者行为度(包括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等相关方面的问题,并讨论翻译活动的平衡度。译者行为度具体指“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求真”是面对原文的,“务实”是面对读者/社会的;前者看求真度,后者看务实度,而理性的译者处于原文要素和读者要素之间,其理性程度与文本平衡度决定着其行为的合理度。合理度是建立在求真度和务实度的基础之上的,三者是互相制约的关系。文章讨论了译者行为度的理性区间、超越译者身份的行为度,以及群体译者行为度等问题,可进一步揭示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为正确开展译者行为研究,提高翻译批评的操作性奠定了认识的基础。这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建设的一部分。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译者行为;译者行为度;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102-13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译者行为研究”(21FYYB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领顺,男,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译者行为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译者行为度[J].外国语文,2026(4):102-114.



0 引言

本文将集中讨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译者行为度的问题,借助充分的事实说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特别是译者作为人其行为度的种种表现,以期正确开展译者行为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

译者行为度是“译者在翻译时所表现的针对原文求真度和面对社会务实度的总和”(周领顺等,2017:22),当然也包括指向最终结果状态的合理度。也就是说,它涵盖了译者行为批评“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等三“度”的内容。《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是这样解释“译者行为度”(degree of translator's behaviors)这一概念的:

译者行为度具体化为“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求真”是面对原文的,“务实”是面对读者/社会的;前者看求真度,后者看务实度;而理性的译者处于原文要素和读者要素之间,其理性程度与文本平衡度决定着他行为的合理度。合理度是建立在求真度和务实度的基础之上的,三者是互相制约的关系。(方梦之,2024:154)

关于译者行为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比如,周领顺等(2017)以“求真—务实”译者行为批评模式为标尺对译者行为度进行了验证,分别划分为“求真”“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务实”等五个渐变形态,并进行了量化统计(周领顺等,2017:24);黄勤等(2026:28)在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下讨论了《骆驼祥子》珍·詹姆斯与施晓菁两个英译本译者行为的三“度”,证明“两译本虽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但都实现了‘求真’与‘务实’的动态平衡,其译者行为在不同的定位下均具有合理性”,就是行为度方面的讨论。而借用三位一体,增强了翻译批评的操作性,也使研究过程更客观。

关于译者行为度,周领顺(2024)从形式方面进行了讨论,而本文主要通过丰富的实例进行考证和思辨。

1 译者行为度的理性区间

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行为,但群体译者的思想和行为却有共性可循,它们总体上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波动,这种波动既是积极的,也是潜意识、本能的,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发挥约束作用。在译本上,这个区间整体上呈“黄金比例”(周领顺等,2025:74)的状态,具体处于“求真—务实”连续统的区间内,该区间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区间。在这个区间里,传统的“忠实”是一个不变的基础,也是求真度的基础,而在翻译活动的范畴内,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能够更好地说明翻译的真实生态。

“忠实”作为一个翻译标准,其起源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它来自哪里,是谁的翻译主

张,但有趣的是,在国际上,大家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这么一种本能的认识,而形成共识的基础是朝原文并主要表现为朝原文的意义靠拢,这是忠实最基本的内核,傅雷将这种理念表述为“神似”,就充分说明翻译与创作最根本的不同:翻译需要母本的限定,以母本为中心,而母本是鉴定意义是否得到准确再现的唯一客观依据,与创作时大脑基于某些素材所进行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翻译的“本”是母本,不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印刷或者雕刻出来的有形的文字文本(所谓“有本”),因此相对而言,与之对立存在的“无本(译写)”也就成了无本之本,“有本”无非是翻译更常见的存在形式罢了。

“求真”兼“务实”是一套“组合拳”,说到前者,就会想到后者,反之亦然,二者互为关系,互为条件,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实践框架和分析框架。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忠实”“求真”“务实”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作为译者指导自己行动的原则、指南、目标、标准、主张和态度等,落实于具体的方法,但求真兼务实组合(“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能够成为描摹在真实的翻译活动中译者行为和译文、译文和社会等之间关系的客观工具。此时,译者单边用作指导自己翻译实践的忠实注定做不到全面,难以反映翻译活动的全部。虽然在传统的翻译批评实践中也有以忠实作为评价标准的,但其适用范围有限,除非是为了验证译文再现原文意义的程度,或作为翻译实践的指导原则时验证译者在实践中的执行程度,比如用许渊冲的“三美论”证明他的译文是不是实现了这些目标,但这种印证式的研究是静态的,没有把翻译作为活动来看待,所以既不现实,也不客观。

对于忠实理念的执行,言一致而行相异者比比皆是,所以会出现主张相同而译文千差万别的情况。在众多的译者当中,许渊冲和许钧两位先生围绕《红与黑》的汉译进行过一场热烈的争论(祝一舒,2024),颇具代表性。若干年后,许钧总结道:“许渊冲先生曾说,他和我在翻译认识上有三大分歧,其中一个是我强调‘再现原作风格’,而他强调‘发挥译语优势’。其实,无论是强调‘再现原作风格’,还是强调‘发挥译语优势’,都不是‘要不要忠实’的问题,不能说我赞成忠实而许渊冲先生不赞成。”(蓝红军等,2023:4)很显然,在求真和务实两个端点之间,许钧偏于求真,许渊冲偏于务实,但都是在这样一个忠实许可的区间内活动的。换句话说,忠实许可的区间就是不脱离原文意义的空间,所以许钧总结道:“我和许渊冲老先生的观点有差异,这并不影响我们都将‘忠实’视为翻译的普遍性品格。”(蓝红军等,2023:4)

译者思想和译者行为的关系,有很多话题可以挖掘,比如除了他们相同的忠实理念和相异的行为外,他们对于忠实内涵的理解是否不一致呢?至少我们需要通过对他们的翻译实践进行对比分析后才能做出最终的认定,否则就可能会动摇讨论的基础。比如常说的“重男轻女”这一主题,涉及家庭生活、教育、经济、婚嫁、养老、社会资源、法律权益、职场等层面的问题,更不用说还有体力、智力、生理、习俗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尽管大的主题相同,

而当谈话双方关注点不同时,彼此应答难免产生鸡同鸭讲的情形。

在求真和务实这一区间内,无论受影响而偏向哪一端,都不脱离“求真为本,务实为用(上)”的基本行为准则。比如,许钧偏于求真,并非他不务实:

绝对地忠实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近乎盲目地跟着原文走,非但不能达到将原文的意义与神韵客观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原作的貌离神散,造成对原作本质的不忠,同时,也由于机械而盲目地追求语言层面的忠实,译出的作品难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理,往往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许钧,2014:233)。

许渊冲偏于务实,他如是论述求真和求美的关系:

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真是必要条件,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那自然是再好没有;如果真与美有矛盾,那不是为了真而牺牲美,就是为了美而失真。如译得似的诗远不如原诗美,那牺牲美就是得不偿失;如果译得‘失真’却可以和原诗比美,那倒可以说是以得补失;如果所得大于所失,那就是译诗胜过了原诗。

(许渊冲,2000:2)

但虽然如此,并非不要求真,而许钧所说的“只有在受到某种限制的情况下,在遇到原文文本的意义与原文作者的意图、译文受众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冲突和矛盾时,译者才会采用变通的方法”(蓝红军等,2023:4)在一定意义上为许渊冲的求真和求美之间的关系作了辩护。

许渊冲从语言性翻译行为到社会性改变行为,直至有时脱离原文而求美的社会化务实行为,一定程度上归结为个性对其翻译的影响。

正是因为许渊冲的个性,才使他敢于提出翻译竞赛论,才会主张“三美”并充分肯定自己是在“创造美”等。从欣赏的角度欣赏“译文”的“音美、意美、形美”通行无阻,但恰恰从理论上解释不了偏离原文的事实。“三美”标准同样适用于评价创作,不强调与原文的对照,就在客观上为偏离原文埋下了伏笔。可见,个性因素直接影响了翻译思想,也影响了翻译行为。

(周领顺,2022:81-82)

受限于传统的文本中心思想,即使像许渊冲宣称为社会“创造美”的译者,也在一边忠实,一边创造,而创造的部分主要囿于语言维。比如,他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语言内部论,他的“三势论”(优势、均势、劣势)是语言整体论,他的“三似论”(形似、意似、神似)和“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是翻译过程论,他的“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是读者反应论。其中,只有“三之论”是面向读者的,且限于读者对译文语言维的赏析,但读者只是市场的一部分,而市场更是社会众多因素之一,其复杂性远非译者所能控制。站在市场的角度看读者,读者已经不是单纯的读者,而是转变为消费者,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读者只需读书,被可读性等因素所吸引足矣,但作为消费者,就需要考虑定价等因素,购买行为

能不能最终发生,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1898年由美国广告人圣埃尔莫·刘易斯(E. St. Elmo Lewis)提出的经典营销模型AIDA[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Desire(欲望)→Action(行动)],就描述了消费者从接触营销信息到完成购买行为的四个连续阶段,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涉及多种因素的互动。

许渊冲的行为游离于传统的文本中心之外,与他创造美的社会目标一致,所以翻译的问题最终转变成了人的问题,而翻译的目的和伦理最终转变为人的目的和伦理。许渊冲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但创造美的目标加上他倔强的个性等因素的强化,使他有了充当作者或者代作者写作的冲动。所以,在开展许渊冲翻译研究时,需要摆脱以翻译策略总结、以赞美或指瑕为主和以忠实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而进行评价的传统文本中心的思路。当把许渊冲作为一种现象、作为人去研究时,就会有与众不同的发现,相应地就会对他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策略、使用了哪些技巧、变换了哪些方法等这些微观上的问题迎刃而解了。许渊冲和许钧似乎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面对翻译材料,有人可能偏向求真,有人可能偏向务实。一个简单的鉴别原则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时,求真是通过语言性求意表现的,务实是通过社会性求用而获得的”(周领顺,2023:69),但翻译的内核并未发生根本的动摇,译者行为的区间仍然是理性的。

2 超越译者身份的行为度

讨论译者“超”行为,不可回避“超求真”和“超务实”的行为及其在译文中的反映,因为译者的“超”行为指的是“超求真”和“超务实”的行为。当然,“超”的行为不限于译者,也包括研究者、评价者和一切的社会人身份行为,既然翻译活动是以译者为中心,那么译者充当这些社会人身份的行为也属于这类情况。我们先来看译者的超求真行为及其与译文求真度之间的关系。

“超”的行为发生于翻译外,既然是“超”,就是超出了翻译范围的行为表现。在翻译外,译者为求索真相,以研究者的身份求取原文意义背后的历史、文化之真,比如美国汉学家译者艾朗诺(R. Egan)认为现存的易安词鱼龙混杂,甚至有多首诗词真伪难辨(艾朗诺,2017:70-80),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现实,他进行了严肃的学术考证并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而学者型译者或者带着学者气质的译者一般会如此行为,尽管会受到各种文本类型严肃度的制约,比如学术翻译要求高严肃度的翻译行为,因此也经常被称作学术型翻译。即使主观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也会包含大量客观的文化信息,如果以求真为翻译的目标,那么进行考证式的学者型翻译也在情理之中,比如余国藩对《西游记》的翻译处理即如此。

不同的译者对杜牧《清明》一诗意境的理解不尽一致,既有人认为其是悼亡诗,也有人认为这是清明时节踏春诗,因为两种描写在文中皆有体现。除了“路上行人欲断魂”一句

有哀伤情绪外,其余诗行皆为春天的景象,充满了浪漫气息。超求真查证得知,在杜牧的《清明》诗中,“悼念”与“踏春”两种氛围并存,源于清明节本身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与唐代社会的风俗密切相关,反映了中国人对生死、自然、生活的独特理解,本质上是清明节“祭奠先人”与“享受春光”双重功能的文学投射。尽管诗无达诂,但译者在翻译时,要保持诗歌总体氛围的一致,所以需要诗歌作超求真对待并在风格上作求真反映。

我们再来看译者的超务实行为及其与译文务实度之间的关系。关于译者的超务实行为,王晓辉等(2026:11-12)通过研究刘宇昆的翻译分析道:“结合译例可以发现,刘宇昆的‘务实’和‘超务实’行为在促进跨文化交流、提升译作文学效果方面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也反映了刘宇昆的文化态度和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影响,而这些理念可进一步追溯至其在美国社会的华裔和作家身份。”检索葛浩文乡土语言翻译语料库(周领顺等,2022:237)发现,译者的超务实行为有多种情况,比如译者的以下几种行为:

第一类:超越原文某种意义的,属于超务实行为。比如:

(1)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A married **daughter** is like spilled **water** .

(2)我可以允许一只猫在我的裤裆里睡觉,但绝不允许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单干。/ I'll let a cat sleep in the **crotch** of my pants before I'll let you be a loner on my **watch** .

(3)这才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呢。/ This is what's known as “The professional asks **How** ? The amateur says **Wow** !” or what we call “Plant a flower, and no blooms will **show** ; drop a willow seed, and a shade tree will **grow** .”

以上的译文增添了原文所没有的形式意义——韵律。译者为了求美而改变了原文的形式意义。

第二类:为求美而改变原文某些内涵意义的,属于超务实行为。比如:

牛皮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 泰山不是堆的! / You can't make a cow big with a genital **blow** , you can't build Mount Tai with just rocks and some **snow** .

在这里,译者为了押韵,特别把原文里的“堆”故意解读出“snow”的意义来。

第三类:译者为实现务实或超务实的效果而省译,属于务实行为或超务实行为。比如,葛浩文未将上例中的“火车不是推的”一句译出。在翻译内部看问题,译者是因为原文繁琐、意义重叠而采取了语内省译,是故意迎合读者的审美情趣之举,这是译者的务实行为。而在翻译外部或者在社会视域看问题,译者故意删减原文可能是出于对消费者的顾念而降低购买成本的举措,此时变成了译者的超务实行为,这样一来就从语内省译转变为语外省译,而语内的读者,也就变成了语外的消费者。当然,单独未译某一句话因篇幅过短,不能完全肯定译者是出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而行为的,但根据葛浩文对于莫言多部作品多处删

减不译的情况看,这样理解也并非空穴来风。

在复杂的翻译活动中,译者作为人,难以抑制自己的创造热情。葛浩文一边坚持翻译应求翻译之真,一边又不能完全说清楚或者也可能是有意遮蔽自己在真实翻译活动中的行为变化,这正说明导致翻译活动复杂性的因素有多种,所以有必要区分“翻译”和“翻译活动”的不同,前者如同在学术的象牙塔内看问题,追求静态的文本意义的求真度,后者走进了社会大众,追求的是译者行为的务实度和最终平衡之后的合理度。

在翻译作为活动的意义上,透明的译文未必最能满足译者等意志体的目标、翻译活动目标、市场规律和社会目标之所需。译者行为批评将研究者带入人学范畴,可解释由人导致的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揭示翻译活动的真实生态,从而给动态平衡及其促发的翻译以更理性的解释。(周领顺等,2025:73)

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于葛浩文身上,也发生于其他译者的身上,比如严复一边坚持“正法”翻译,一边又实践着“非正法”翻译。

超务实行为以译者为代表,但不限于译者,还包括译者和出版社的合力行为等行为,这一点正说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闵福德在谈到葛浩文时说道:“莫言是山东人,单纯朴实。他的作品篇幅虽然都很长,但他遇到了一个好‘译者’,将他的作品进行了缩译。”(朱振武等,2017:55)他给“译者”加了引号,说明他注意到了译者角色化的现象,或者角色化为作者,或者角色化为宣传者等,甚至彻底脱离原文的意义而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实现译者身份化。我们来看周百义(2023:220)对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进行的超务实处理所作的分析:

从译作上看,一是删去了原文每一章开头作者引用的历史文献摘要。二是删去了文中的议论性文字和小说结尾长达五万字的思辨文字。三是在行文中删去或替换了一些需要解释的专有名词,如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域外读者不甚了了的花木兰、岳飞、祥林嫂等专有人名,以及对一些“权术”“计谋”等涉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内容略去不提。四是对文中繁琐、重复之处适当删译。

这些是译者角色化的表现,也是出版社对于市场普通读者对象的定位。出版社没有将其作为学术书对待,所以删去了“原文每一章开头作者引用的历史文献摘要”和“文中的议论性文字和小说结尾长达五万字的思辨文字”。有的显然不属于一般务实层面可读性的范围(比如市场因素),他既有删,也有增。他对于中国历史人物的改写、说明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中国文化、保存中国文化,而是从市场译入的需求考虑的,超出了原文本身的意义以及对于原文意义的处理或应用。他以社会人面目出现,其充当作者、研究者等超越译者身份的角色表现就都可以理解了。王晓辉等(2026:11-12)通过研究刘宇昆的翻译而认识他的身份:“刘宇昆在译入语社会的‘社会人’身份是其‘务实’和‘超务实’行为的深层动因,华

裔和作家身份分别在文化和文学层面影响着其译作内容的取舍和呈现方式。”

关于译者和出版社的合力行为,周百义(2023:220-221)分析道:

企鹅是一家商业出版社,要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度。《狼图腾》的原作有51万字,如果翻译成英文会有足足上、下两册,不便于市场销售,也不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据葛浩文介绍,出版社编辑要求他“删去三分之一左右”的内容。

译者角色化为市场的代言人,二者表面上是对读者负责,实际是借关心读者之名而对市场负责,至于不同语种版本的长短,与目标民族读者的阅读偏好有关,当然这也是一种市场行为。译者的超务实行为以及译者和出版社的合力行为,一般也会产生相应的超务实社会效果,不管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总之属于“超”的范畴。译者、出版社的超务实合力行为,既是社会性的表现,也是译者根据社会的可能反应而做出的选择。

不管怎样处理,只要与翻译目标相符,如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超务实行为的表现。正是以上各方的超务实努力,才产生了超务实的社会效果,并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企鹅北京总经理周海伦对《中国日报》记者表示:“《狼图腾》的销量让她和公司的同事‘欢欣鼓舞’。”虽然她不愿透露具体数字,但她指出:“《狼图腾》英文版自出版一年半以来,创造了所有在国际市场销售的中译本小说的最高销量纪录。”(周百义,2023:222)

以上各方的超务实行为说明,翻译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对于译文最终的生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他包括“添加、省略和替换是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和阅读期待为基础的,是译者脱离原文意义对译文的调整,(都)可作为‘超务实’行为的衡量指标”(王晓辉等,2026:6)。

讨论译者行为的务实度,需要涉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平衡度的把握问题。翻译活动讲究平衡,而调动平衡的中心永远是翻译目标,只是因为翻译性质的束缚而要求我们要时时顾念母本的存在。钱锺书(1984:705)说过:“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所以,在正常的“译意”翻译策略明线之外,还有一条暗线在游动,它们是“厚译”“薄译”“浅译”“创译”“创造性变译”“音译”“省译”“略译”“忠实性叛逆”“忠实性再创造”“创造性叛逆”“二度创作”等各种“非正法”翻译。它们都是译者的社会性行为 and 超越翻译的行为,涉及译者的身份、意志、行为等,很值得研究,到目前为止,研究还不够深入,多停留于现象表面,比如将这条暗线看作翻译技巧,却说不透为什么又不见于传统翻译技巧的名目中。这类命名是研究者在解释不动现象而又被现象打动时使用的遁词,它们既不属于技巧名目的范围,也不会停留于翻译策略的表层,总体上反映为译者在翻译目标导向下的社会性行为。

翻译的平衡问题需要置于社会活动的视域内考察,译者行为的平衡总体上是译者在考

虑了各种因素并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后所作的本能选择,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与AI译者相比,人类译者处于复杂的社会之中,只有人类才能纵观全局,更好地把握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各方的需要,从而做出理性和平衡的选择。

3 群体译者行为度

我们从翻译批评的角度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两处地名(广陵、扬州)进行超求真考证并对其翻译进行讨论,主要讨论群体译者行为的规律,确立群体译者行为度。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好友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扬州市),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相送至江边,作此诗以记述。原诗如下: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在同一首诗中将同一个地方分别写作“广陵”和“扬州”,章燮在其注疏的《唐诗三百首》中考证为“叙时,通典,广陵郡,今之扬州”。两个地名同指一处而用于诗名和诗文的情形并非鲜见,因避免了重复可看作一种写作的手法,仅唐代诗人就有韦应物的诗名《酬柳郎中春日归扬州南郭见别之作》和诗句“广陵三月花正开,花里逢君醉一回”,李洞的诗名《送韦太尉自坤维除广陵》和诗句“全蜀拜扬州,征东辍武侯”,姚合的诗名《扬州春词三首》和诗句“广陵寒食天,无雾复无烟”,刘商的诗名《送薛六暂游扬州》和诗句“广陵行路风尘合,城郭新秋砧杵多”,章孝标的诗名《及第后寄广陵故人》和诗句“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等,但使用同一个地名贯穿全诗者也不鲜见,因有强调状述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写作手法,比如李白就有诗名《金陵酒肆留别》和诗句“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用的是同一个“金陵”。这也说明,虽然“言以简为贵”,但冗言自有其用。前者以交际省力为要,后者以文学描写细腻取胜,有助于达到强调和传神的效果。

虽然具备汉文化背景的读者对两个地名之间的关系耳熟能详,但地名在译文中被忠实转换为汉语拼音时,难免不会令异域的读者生疑:题目上讲的是去 Guangling,怎么在诗中变成了去 Yangzhou(Yangchow、Yang-chou)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只忠实于原文,可能会影响交际,按照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话语,既要做到“求真”又要做到“务实”。众多的译者是不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同的译者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我们搜集到18个译本,译者既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外国的,包括华人译者在内,既有独译,也有合译,其中不乏超务实处理,甚至半超求真和半超务实处理。根据译者对于两

个地名的处理而将译诗分为以下三类:

序号	译者和译本	翻译处理
1	孙大雨译本	扬州、广陵两个地名均保留/求真处理
2	任治稷和余政译本	
3	许景城译本	
4	陈君朴译本	
5	屠岸和屠笛译本	
6	朱纯深译本	
7	柯睿(Paul Kroll)译本	
8	许渊冲译本(有两个译本,看作一个)	扬州、广陵两个地名均不译/半超求真和半超务实处理
9	庞德(Ezra Pound)译本	
10	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	合二为一选其一(或保留扬州,或保留广陵)/超务实处理
11	路易·艾黎(Rewi Alley)译本	
12	王守义和约翰·诺普弗尔(John Knoepfle)译本	
13	万昌盛和王间中译本	
14	王大濂译本	
15	张炳星译本	
16	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译本	
17	戴维·亨顿(David Hinton)译本	
18	唐安石(John A. Turner)译本	

鉴于这是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看问题的,所以有“求真处理”之说,但实际是不够准确的。“求真”和“忠实”的不同在于译者行为批评中的“求真”和“务实”是相互牵制的关系,在进行求真时,总有务实目标的牵制,比如目标因素和对于读者、消费者等利益方的顾念,而“忠实”只是译者对于自己单方面的要求,尽管在事实上译者心理上也会有务实的思想和目标等因素对译者行为产生的影响。“求真”和“务实”虽然可以单独使用,但从来不是割裂的关系,并在事实上呈现为“求真—务实”连续统一体。

三类地名的处理像在一个连续统上,既有两极(扬州、广陵两个地名均不译和均保留),也有中间状态(合二为一选其一,或保留扬州或保留广陵)。行为过程中充满各种因素,彼此的互动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我们仅针对不同译者对于两个地名的处理,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

第一类:扬州、广陵两个地名均保留。

这一类有七个译本,译者无疑坚持了传统的忠实翻译原则,不计较两个地名形式上的差异可能产生的交际问题,这一类译本处于连续统的左端,靠近原文,是基于原文意义的求真处理。这一类可称为忠实派或者求真派,在翻译内部,其求真度最高。

但是,外国译者柯睿(Paul W. Kroll)译本的出现,又为这样的结论打了一个问号,他或许是重在看待诗歌所创造的意境。毕竟,以唯美度最高的诗体呈现时,读者期待的首先是美感所产生的感官冲击力,其次才是其中的客观信息。外国译者来自目标社会,不可能不顾及目标社会的需要,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他就应该归入第二类:唯美派。

第二类:扬州、广陵两个地名均不译。

这一类只有许渊冲的两个译本和庞德(Ezra Pound)译本。许渊冲的两个译本因差别不大可看作一个译本。忽略地名不译,是忽略文化之真,当不以传递文化或者客观信息为主时,常常是“诗人翻译家”(poet-translator)(Liu, 1982:37)的主要作为,求取的是原文所营造的美学氛围。正因为有这样的审美取向,所以许渊冲把“扬州”译为 River Town(江城),意境优美,与扬州地名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异曲同工。而庞德甚至将地名(黄鹤楼、广陵)和人名(孟浩然)一并舍去,除了他的审美追求外,还与他重视意象的使用是分不开的,他的译文脱离了原文形式的约束,选择将离别的画面传递给读者。这一类既非超求真,也非超务实,而是在超求真和超务实之外对于美感的半超求真和半超务实的追求。这一类可称为唯美派,兼顾翻译内部和外部,处于求真度和务实度的中间状态。

第三类:合二为一选其一(或保留扬州,或保留广陵)。

这一类是中坚力量,有九个译本,译者中既有中国人(万昌盛和王间中、王大濂、张炳星),也有外国的汉学家(Witter Bynner、David Hinton、John A. Turner),还有中外合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王守义和 John Knoepfle),他们都有交际的意识,因此才会对两个地名产生顾虑,也才会做出这样的超务实合并。具体而言,选择保留扬州的有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路易·艾黎译本、王守义和诺普弗尔译本、万昌盛和王间中译本、王大濂译本、威特·宾纳译本、威特·宾纳、亨顿译本;选择保留广陵而舍弃扬州的有张炳星译本和谭雅各译本。显然,前者所占比例更高。

由于唐安石未将扬州译出,所以受到了我国翻译批评者的批评。比如,方梦之(2024: 492-493)在“文化意象”词条中写道:

唐诗英译者唐安石在翻译被蘅塘退士誉为“千古丽句”的李白的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时,把这句诗译为 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 go, 而把原诗中“扬州”一词略去未译。英译者很可能以为此句中的“扬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名罢了,略去不译也许与诗意无大损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考虑诗押韵的需求,不得已而为之。)翁显良(1981:5)指出:“殊不知‘千古丽句’之丽正在于‘烟花三月’春光最美之时,前往‘扬州’这一花柳繁华之地,时与地二者缺一不可。”“倘若他(指英译者)了解唐代扬州的盛况,听过但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大概不会这样处理。”

唐安石是外国人,进行这样的批评好像有充足的理由,但许渊冲作为中国人,不可能不

知道扬州的文化意义。所以,当译者不求取历史、文化信息之真为目的时,那么强调扬州是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就失去了针对性的靶子。不宜立足文化说文学,毕竟文学是以呈现文学性为主要目标的,也不宜单纯地将自己的立场作为评价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将译者的翻译目标、定位考虑在内,才算找对了批评的对象。况且,唐安石虽然未译出“扬州”,但他译出了“广陵”,这一点在上述批评的词条中并未提及,立论未必确当。

选择保留扬州或者广陵可能最终取决于译者认为哪个地名能产生更强的冲击力或者更有文化的厚重感,但根据比例看,扬州这个地名在当下更有冲击力,因为它也是正在使用的一个地名,即使从这一点讲,也应看作拥有交际意识的一个表现。这一类可称为务实派,在翻译外部,其务实度最高。

为了说明译者在该区间内行为总的合理度,我们不妨借用《习近平给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所说的“准确传神”(习近平,2022)四字作为翻译实践和评价的指导原则,即既要“准确”又要“传神”。“准确”指向内容的求真,而“传神”则指向讲述方式的务实。之所以把“传神”归为务实一端,是因为它旨在吸引读者,与务实举措是一致的,前后互为条件,最终达到理想的平衡,而只有在翻译活动中达到理想的平衡,才是真正实现了动态的平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人民日报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新华社,2015)。

我们从评价者的角度展示了译者超求真和超务实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考证的过程和评价的过程。

4 结语

本文讨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译者行为度及其相关的问题,包括译者行为的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并讨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平衡行为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研究中的问题,也是理论上的问题,都属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建设的一部分。

在讨论译者行为度时,通过实例,有效区分了“超求真”和“求真”“超务实”和“务实”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译者的身份和行为变化,充分证明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认识这些,将有助于正确开展译者行为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从而提高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总之,开展译者行为度的讨论,将有助于透视译者行为上的问题,进而增强翻译批评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 艾朗诺. 2017.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M]. 夏丽丽,赵惠俊,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方梦之. 2024.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黄勤,陈彦池. 2006. “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下《骆驼祥子》两英译本译者行为合理性比较研究[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 (3):28-37.
- 蓝红军,许钧. 2023. 关于翻译的实践品格——许钧教授译学思想访谈录[J]. 英语研究(18):1-10.
- 钱锺书. 1984. 林纾的翻译[G]//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696-725.
- 王晓辉,高茜. 2026. 译者行为批评双中心评价系统下的科幻小说英译研究——以《北京折叠》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48-66.
- 许钧. 2014. 翻译论(修订本)[M]. 南京:译林出版社.
- 习近平. 2022. 习近平给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的回信[J/OL]. [2026-04-25].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26/content_5706952.htm
- 新华社. 2015. 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用海外乐于接受方式易于理解语言 努力做增信释疑凝心聚力桥梁纽带[EB/OL]. [2026-04-26].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5-05/22/content_1568005.htm.
- 许渊冲. 2000. 新世纪的新译论[J]. 中国翻译(3):3-7.
- 周百义. 2023. 《狼图腾》海外翻译与传播研究[J]. 华中学术(41):216-227.
- 周领顺. 2022. 译者行为研究的人本性[J]. 外语研究(2):78-83.
- 周领顺. 2023.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二)[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4):62-71.
- 周领顺. 202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三)[J]. 外国语文(1):84-96.
- 周领顺,等. 2022.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领顺,杜玉. 2017. 汉语“乡土语言”葛译译者行为度——“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视域[J]. 上海翻译(6):21-26+93.
- 周领顺,周怡珂. 2025. 翻译实践“黄金比例”命题——译者行为批评路径[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71-79.
- 朱振武,闵福德. 2017. 拿出“最好的中国”——朱振武访谈闵福德[J]. 东方翻译(1):50-56.
- 祝一舒. 2024. 许渊冲与许钧的学术论争焦点及其启示[J]. 外语教学(1):14-20.
- Liu, James J. Y. 1982. *The Interlingual Critic: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gree of Translator's Behavior in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ZHOU Lingshun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issues related to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al dimension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BC) theory, including truth-seeking, utility-attaining, and rationality, while also addressing the balance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al dimensions are operationalized as “truth-seeking”, “utility-attaining”, and “rationality”: “truth-seeking” is oriented toward the source text, while “utility-attaining” is oriented toward the reader/society. The former is evaluated by truth-seeking, the latter by utility-attaining. A rational translator occupies the space between source-text elements and reader elements, with the degree of rationality and the textual balance determin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ir behavior. Rationality is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are in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constraint.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rational range of translator behavioral dimensions, behavioral dimensions that transcend individual translator identity, and group translator behavioral dimensions. These discussions can help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lay a cognitive foundation for properly conducting translator behavior research and enhancing the operabilit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is paper is part of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ory.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ranslator behavior; degree of translator's behavi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责任编辑:龙丹